

大生纱厂早期的纱管供应商孙淦

□朱江

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孙淦长年旅日经商,被张謇誉为“爱国者华商也,商真不负国”。他在日本大阪经营的缙源慎商会,是大生纱厂早期的纱管供应商。



孙淦(1858—1938),字实甫,中国红十字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长年旅日经商,被张謇誉为“爱国者华商也,商真不负国”。孙淦在日本大阪经营的缙源慎商会,是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早期的纱管供应商。

张謇与孙淦之间最早的交往记录,笔者目前可见的是孙淦从日本写给张謇的三封信,分别写于1900年1月12日、1900年3月5日和1900年3月9日,内容主要涉及供应纱管事宜。其中1900年1月12日信函的信息量最大,从信中“上月初,缘怡和囑舍亲来信拟办此项纱管,故已由西京丸装去三箱(内特别锡口纱管式箱、条筒乙箱)”可知,1899年底,怡和洋行牵线,通过孙淦的亲戚、上海瑞乐洋行的买办张趾麟写信到日本,为大生纱厂订购纱管,接到订单后孙淦已经发出3箱纱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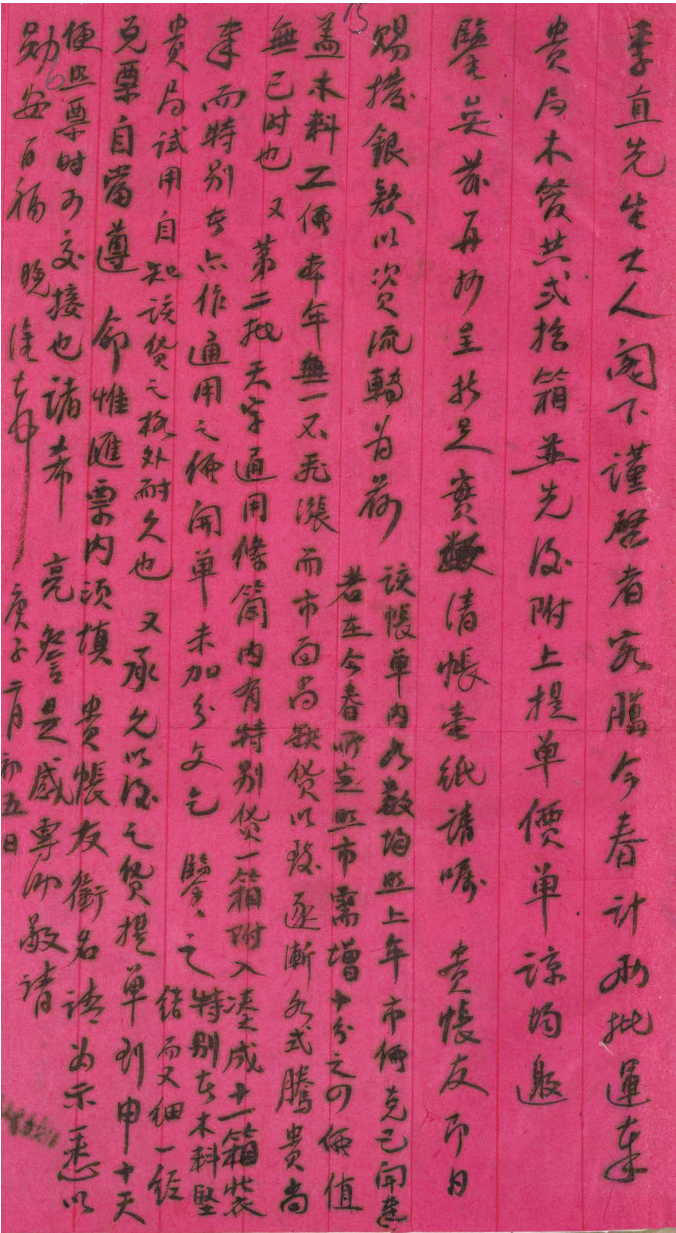
这里提到的纱管,其实包括条筒和纱管,条筒用于装棉条,纱管用来缠绕棉线,是纺织企业的必备工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纺织企业使用的纱管依赖进口。1947年,蒋乃镛认为:“我国之有纺织工厂,虽已有数十年之历史,但制造纱管而成一业,仅近数年之事,且数量有限,不能与纱锭成正比例。其原因主要为订购纺织机器时,纱管亦随之而来;嗣后又由五金商行从中供应,货品亦限于英美日货。”董竹君1930年春,在上海闸北开办群益纱管厂,是得到其二叔的指点“这生意有前途,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靠日本货。日货质量好,但是进价贵,成本高。如果我们厂将来的出品能够赶上日货,价又便宜,一定有销路”。“一二八”事变中,群益纱管厂遭损毁停工,1932年8月1日以荣记名义重新开工。1933年12月,群益纱管厂破产清盘。由此

可见,日本出产的纱管市场占有率高,从大生档案看,大生纱厂至少在创办之初,采用了大量日本的纱管,主要通过孙淦在大阪川口三十二番开设的缙源慎商会购买。

1900年1月12日孙淦的信里,关于运往大生纱厂的纱管的情况是这样的:“谕购木管,今特先装九箱,另附细单壹页,所余天字条筒壹万五千个及宇宙小条筒尚余壹万个,准定年内装船,决不延误,刻已加工赶造矣。又字字三号条筒前样乃敝厂寻常之货,今拟配坚木特别者各半,口径式样均皆一例,以备后验。天字一万五千个均做特别坚木。今装山城丸三号条筒五箱(寻常式箱、特别三箱),又纱管四箱,敝纸附奉,另有中、西文发货单各壹纸,报关时请附入。”信中反映出大生纱厂所购纱管,为孙淦设厂生产。由于大生纱厂购置数量较大,孙淦采取一边生产、一边流水发货的方式。

不过对于纱管过关纳税事宜,孙淦表达了担忧和愤怒,他在信中告诉张謇,上次通过“西京丸”运往上海的3箱纱管,在江海关遇到麻烦:“被验关者强加倍许,每个估价银三分半,若不照估,勒令原货装回云云”,孙淦认为关员过于无情无理,简直横征暴敛。他声明纱管断无这么高的利润,无法忍受这样的欺负,希望张謇能主持公道,把他写给江海关税务司的函件转给上海道台,获得按照实价征税的权利。

大生纱厂支付孙淦的纱管货款,是通过位于上海的沪帐房办理的。大生档案保存了4张相关的汇票及其票根。其中3张是由位于“英界二洋泾桥北逸沿浜怡顺昌内益生东”前来汇兑,益生东为商号,似为孙淦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具体情况为1900年3月9日规元500



1900年3月5日孙淦致张謇有关棉纱筒管贸易的函,原件藏南通市档案馆。

两、4月23日规元500两、7月6日规元400两。还有一张由张趾麟汇兑,为3月9日鹰洋100元。

孙淦与大生纱厂的合作关系,至少持续到1904年。这年的10月16日,孙淦在大阪发出如下货单:“今装泰生船运上大细棉纱(一百廿、一百六

十)壹箱,计重四拾磅,计原金九拾六元正。水力金壹元、装送等费金四角、染工金六元四角、木箱壹只金壹元、报费金叁角、京阪运费金五角,计金九元六角。统共计金壹百〇五元六角。”大生沪帐房注明,10月22日到沪。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历史人物

沙元炳与祝福申

□长皋

沙家与祝家都是如皋旧时富甲一方的望族。近读孙建华君《许家巷大院》,文中又述及祝福申与沙元炳的后人结为秦晋之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喜看如皋文史,沙元炳、祝福申的交游史料,我陆陆续续读到不少,略述如下。

祝福申年长于沙元炳。清末《如皋商务分会职员姓名名录》有录,沙元炳时为如皋商会分会总理(会长),祝福申已是名誉会员,其弟祝寿慈是议董。祝氏兄弟力助沙元炳管理好如皋商会分会。

1914年,祝福申辞世,享年58岁。1917年,其子为他下葬于县东汤家湾河南之原,并向沙元炳先生求写传记。既有友情,又有亲情,沙先生为故人作《扬州府学训导祝君墓志铭》。据此,祝福申(1857—1914),字舒恺,号少农,韦福申,清赠中议大夫、扬州府学训导。他为家中长子,16岁那年便已失去父亲,依靠母亲陈氏及叔叔的照顾,长大成人。祝福申本已被授予扬州府学训导一职,但考虑母亲年事已高,他拒受官职。清末时期,沙元炳积极在如皋创办师范学校,祝福申给予大力支持,取出“千金”支持地方办学。日后,如皋地区遇到兵燹或荒灾,祝家都全力捐献。乡人感念他的无私捐献,奏报朝廷,祝福申才获封“清赠中议大夫”。沙元炳在文中,还赞誉祝福申“节性以淡,保家以俭,择交比药”。

沙家在祝福申眼中又如何呢?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沙元炳为其长女作传《祝氏女哀辞》,便有记述:祝福申向沙家求亲,理由正是他当面与沙元炳所言:“听闻孙夫人(沙元炳母亲)教导子孙有方”,言下之意沙家是有教养的家庭,于是才向沙家求婚。因此,祝福申次子祝光樾(祝荫中,1886—1960)得以迎娶沙元炳长女沙珠(沙辉淑),结为连理。

昔日,苏轼笑言黄四娘名入杜甫诗作,从此名垂千古。祝福申事迹流传于世,定要归功于沙元炳为他撰写墓志铭。这篇《扬州府学训导祝君墓志铭》不仅录入沙翁遗集《志颐堂诗文集》,而且还印过单行本。“苇航书屋”现存旧印《扬州府学训导祝君墓志铭》两册,一册为蓝色封面,一册为黄色封面,同为上海震亚图书局发行。值得一提的是,两版《扬州府学训导祝君墓志铭》都是由晚清书法名家清道人李瑞清抄录,又有曾熙、胡小石两位书家题跋。李瑞清、曾熙,胡小石三位名家的手泽,又为沙元炳与祝福申的交游史,添上一段佳话。

吴俊升与朱自清的 记忆交集

□彭伟

如皋籍教育家吴俊升(1901—2000年)在回忆录《教育生涯一周甲》中,追述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诸多往事,涉及了作家朱自清先生:

……随三校(北大、清华、南开)文学院院长迁到南岳上课。这时是1937年秋季。三校文学院院长集合一起,人才济济,为名山生色不少。文学院院长由文学院教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我被推为委员会召集人兼主席……上课数月,发生一不幸事件,有一学生在校旁黑龙潭游泳,失足受伤,校中没有医药急救设备。我和朱自清教授伴同受伤学生乘滑竿下山到镇上卫生事务所,以为可以急救,孰知该所只讲卫生教育,并无医药急救设备,眼看该生当场死亡,不胜痛惜。

作为吴先生的晚年作品,记忆与细节,难免失真,且是孤证。至于被救治学生的名字与时间,又未提及。因此,其他佐证,值得探讨。1937年11月16日,另一位当事人朱自清于日记中写道:

检查宿舍。何与钧于白龙潭失足坠下,二小时死去,甚惨。关于救治学生一事,朱自清只录一句话,不过事发地点已有两种说法,“黑白”需分,否则浑水“一潭”。清华档案中对此存有一份刘崇鋐(历史学家)的简短报告:

今晨有北大学生何君与钧(广东大埔人,国文系四年级)在白龙潭瀑布处爬(爬)山游玩,突失足下坠数丈直至崖底,头与下部均跌破,流血染石尽红,急送至南岳市就医,已不救。十时坠崖,十二时许逝世矣。至可悼惜。该生伤重,虽有校医,恐亦不能救,但二三百人山居无医,确是冒险,希能早促校医来也。

南岳有黑龙潭,又有白龙潭。位于校舍(清华园圣经书院)附近的是白龙潭,除去吴先生的回忆,清华档案、朱自清的日记,及其他史料,都记载事发地点在白龙潭。至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参考《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岳日记》诸作记录,整理如下:

11月16日的早晨,两天后就要开学,傅幼侠(清华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前往白龙潭游玩。他还没到刻石处,便听到高亚伟(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慌慌张张地呼喊:有同学掉入潭中。傅幼侠跑回校内叫人求救后,又顺着小道爬向潭底。失足学生是何与钧。他约于早上10点跌落。吴俊升、朱自清随后赶到,将遍体鳞伤的何君送往山下的卫生事务所治疗。没想到的是,卫生事务所徒有虚名,无法治疗。朱自清、吴俊升无奈目送学生于12点左右离世。正是在不久前,日军入侵,这位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何与钧逃离北平,在廊坊被拉下火车。他见日军一时大意,立即逃跑。日军在他身后,连连开枪,未曾击中,他侥幸活命,却在南岳意外摔死,令人扼腕叹息。柳亚子的哲嗣柳无忌,也在南岳执教。11月16日,他刚从长沙回来,便于当天听闻噩耗,沉痛写下:一失足成千古恨。

事故发生后,在校方众多教授中,吴俊升携手朱自清,出面陪伴学生下山求医,无道理。《刘崇鋐函梅常委报告南岳情况》(清华大学档案,写于1937年11月6日)记载:文学院院务由委员会主持,吴俊升先生为主席,朱自清先生为书记……这段档案证明吴俊升的相关回忆十分准确。他和朱自清先生,同为文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学生发生事故,他俩及时出面处理,实为职责所在。

何君意外死亡,给予学校师生很大的启示。吴俊升的“不胜痛惜”、朱自清的“甚惨”,刘崇鋐的“至可悼惜”,柳无忌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异词同悲,无不表达了他们心中深添的苦楚。刘崇鋐希望校方早日派遣就医来南岳,避免悲剧再度上演。吴俊升先生更有想法,铭记此事,痛恨不明医药只讲卫生教育的卫生事务所。他日后任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竭力反对在教育学院设立卫生教育系,而是主张卫生教育系归入医学院。这正是对死者何与钧的安慰。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史海回眸

踢毽子,唐代起即已盛行,用几根鸡毛(一般为雄鸡毛),一枚铜钱,半截鸭毛管和一小块绒布做成毽子,结对或群体游戏。1928年12月,在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时,举行了我国第一次踢毽子公开比赛,推动了这项民间体育项目的发展。南通民间,过去也盛行踢毽子活动。

1933年1月,南通公共体育场与民众体育馆发起举办“毽子竞赛会”,刊登启事,征求报名。社会各界有兴趣的人士均可报名参加。竞

赛会赛期原定2月9日至10日(农历正月十五、十六日),后因考虑到学生、儿童受学校课程安排限制,故将比赛时间改在星期天即12日上午9时开始。有30多人报名参加角逐,最终,通师实验小学(今通师一附)学生王椿裳获得总分第一名。当天下午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颁奖仪式。王椿裳踢毽子动作纤秀,样式自如,分“单、拐、踱、倒势、扒、盖、顺、连、扳”9段,赢得评委一致好评。

1933年3月26日,南京市举行

90年前南通的踢毽子比赛

□程太和

了全国性踢毽子比赛,据当时媒体报道:“报名参加者颇为踊跃,其中有河北的傅子衡、金幼申、杨介人三人,对于踢毽子极有经验,能踢之花式均有百余种之多,观者无不赞美。此外,有著名体育家及踢毽能手参加。”比赛结果:河北杨介人获普通踢(盘踢)和花样踢第一名;傅子衡、金幼申并列普通踢和花样踢第二名。三人所踢花样都有百余种之多。第四名的花样有三十多种,第五名的花样有二十多种。在颁奖会上,杨介人、傅子衡、金幼申三人再次进行了表演,还拍了电影纪录

片。1933年10月举行的全国体育运动会上,踢毽子同拳术、摔跤、弹弓、剑术等民间运动项目一起,又进行了比赛。上海运动员周柱国、河北运动员傅子衡和金幼申分别获普通踢前三名,浙江运动员谢叔安获第四名。上海运动员陈鸿泰获特别踢第一名,上海运动员周柱国和河北运动员金幼申分别获特别踢第二、第三名,河南运动员路锦城获特别踢第四名。运动会比赛后,金幼申、傅子衡还在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大学、中学等单位进行了多场表演,得到各界人士好评。

盐韵悠悠话包场

□林炳堂

费支绌,又将金陵公荡4090亩,作价8000元入股。随之而来的剔亭荡、开河、筑堤建涵闸、划区、建屋等,这样一来集资款由原来的十万增加至三十万,后来又增加到五十万,公司性质也由原来的合资公司改为股份公司。1914年4月30日,大有晋正式股东会议在包场镇召开,到会股东41人。会议对上述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公司并从股本中划出四万元作为盐业的营运资本。

在随后的“大有晋股份有限公司续订办事规则”中明确:盐业方面:盐垣分公司于本邑东包场镇专派管事,经营亭灶、煎制、收运、销售、垣盐等事。并设置管事一员,副管事一员,司事一员,夫役二名。管事、副管事辅助管事分任执行下列职务:管理垣店、草荡、亭场、灶舍、锅敞、储盐、车牛什物及其他一切财产等项事项;执行查煎、收盐、储售运销及其他一切营业等项;管理煎务、草务、约束煎丁,修理埝灶亭路等级事项;分配员役勤务,并监督勤惰,执行奖惩、报告等等。同时约定,盐业会计应独立计算,以维持现状为准则。自此后,包场作为大有晋公司盐业的大本营,统管盐业营运一切事务。

大有晋将盐业三垣归一后,在管

理和经营方面有较大长进。1913当年获利1813元。除1914年受欧战影响,运盐盘驳,有所亏损,其后几乎年年盈利,最高的1917年盈利达13081元。据大有晋公司账略统计,自1913—1921年九年,大有晋盐业共盈利15933元。此时,盐包场上盐坨高耸,运盐河上舟楫往返不息,大有晋盐业几乎到达顶峰阶段。然而,到了1923年,公司推广板晒盐遭受挫折,亏损达18610元。公司董事会议决:盐业已成弩末,不复进行。将运营本四万元收回,所有历年积亏及板晒折耗一概开除,藉以结束。此时,大有晋总公司遭受债务困扰,盐业也渐次走于下坡。1925年6月,公司取消盐务管理处。1928年12月,董事会议商定变卖包场镇市房抵还债息,并将包场盐业招商承租,免致赔垫。1931年12月,大有晋公司整理委员会议决将包场镇市房四十间平均作价一万二千元,抵还债息。1938年4月南通事变后,大有晋公司暂移沪办公。从此,广阔的盐包场上盐坨消失,渐次荒凉。包场作为盐业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大有晋公司的房屋被国民党反动派拆了去修炮台。

如今,“盐包场”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浓浓的盐韵依然滋润着古镇包场。

地名掌故

包场,是一个因盐而诞生的地名。据记载,清中后期随着泥沙沉积,海势东移,原来中部的产盐地由石港场、西亭场、金沙场逐年东移,集中到了余西场、余东场。这期间,包场老皇岸往北8里外的沿海就布满了盐灶,统归余东场管辖。繁盛时,有亭100多个,灶200多口,盐丁600多人。“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是当时沿海滩涂的情景。

包场因近靠盐区,又有老运盐河贯通,便成为盐商们首选之地。清咸丰年间,镇江人捷足先登,在包场镇开设了颜德泰盐店、义记盐店。颜德泰盐店位于镇东首,称之为东盐店。义记盐店位于镇西首,称之为西盐店。随后又有广东人开办了德长厚盐店。德长厚盐商实力雄厚,集亭、煎、草、销为一体,兴盛时拥有垣地20多处,煎亭300多个,草地1.2万多亩,店房60多间,雄居包场镇中心。

当初这些盐店均系私商集资经营,专门收购附近盐区所产之盐,堆积在盐包场,然后通过老运盐河再营销各地,从中获取利润。外地盐商的进入给古镇带来一定繁荣。一些较大的盐商在镇上建起了市房、会馆和寺庙。德长厚更是首屈一

指,其规模列诸多盐商之首。包场因此也成为盐业经销的重要集散地。

清末淮北盐场兴起,所产的晒盐“比诸通泰如各场煎盐费省至1与15元之差”。当时淮南所产之盐均为煎盐,成本高盈利低,“于是产盐趋于淮北,而淮南煎盐业渐次衰落”。受此冲击,余中场的两家垣商德长厚和积丰顺“以困弱之力无力继续,目击淮南盐务疲滞,渐向渐灭”,又因“欠交官款无以出”,于是“愿尽卖其垣产”以脱困境。

张謇自兴办大生纺织公司后,为筹谋原棉不致匮乏,又目睹淮南盐场疲滞困弱之局面,于是大力提倡废灶兴垦,种植棉花。1913年春,他与三五同人集合资本买余东积丰顺、德长厚垣产和荡地,开办盐业,兼事拓植,尽辟地利为发达之充分。初议股本洋10万元,创立大有晋盐业公司。公司初创时,分为盐业和荡地两部。经对包场原德长厚店房进行修整,扩建,设为盐业中心,公司前辟有一块广阔的堆盐场地,俗你“盐包场”。不逾月,余西场裕和祥垣产荡地相继并归,续议股本四万元,添置荡地须六万元,共计20万元。为解决唐闸新育婴堂经